

## 坊间纪事

# 织心

□ 刘 欢

想织一条围巾，从舅娘开始。

那一年的冬天，舅舅和爸爸从北京打工回来暂歇我家，舅娘一早就带着孩子从乡下来了。九点左右，他们终于回来了。大家兴奋而激动地招呼着，舅娘和我们一起忙着。热闹的早餐后，大家开始聊天。舅舅笑爸爸把所有东西都舍不得扔，全拿回来了，说自己把没用的行李都扔掉了。舅娘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她急急地问道：“都扔了？你说你都扔了！”舅舅解释说只把没用的扔了。舅娘仍然嘀咕着：“你怎么能都扔了呢？那我给你织的那件毛衣呢？”

“那件毛衣啊？我穿在身上的。”

“在哪儿？我看！”

舅舅翻出外套下的毛衣，舅娘立刻瞪大眼睛叫起来：“不是这件！在哪儿呢？”她显然有些生气了。但舅舅仍然在翻看，那件毛衣下，终于露出了一件红色的毛衣。“这不是？”舅舅得意地说。舅娘一下子变得从容起来。“这件毛衣是你织的，我没扔，穿在最里边呢！”舅舅笑着说。

“哦，没扔就好。”舅娘没有意识到，自己此时的笑容已如春花绽放。然后他们一起出去逛，一家三口，说着，笑着，整个冬天被亲情晒得暖暖的。

久别重逢，没有热烈的拥抱，没有矫情的问候，没有深情的对白，只这样几句拌嘴、几个变化着的表情，却让人感动不已。这样的爱自然温馨而又深入骨髓。在悠长的岁月中融入每顿粗茶淡饭，化成叮咛甚至唠叨，于是才有了这恼人却温暖的亲情。

多年以前，在我的学生时代，女生们都喜欢在雪花落下之前织围巾。上课前的教室，总能听到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生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她们凑在一起品论着对方围巾的颜色、花纹，比较着自己手中的半成品，或者相互请教不同的织法。上课铃声一响，所有的声音与动作即刻收起，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地起身，庄严地随集体道一声“老师

## 心灵小品

# 锥心的眷恋

□ 赵泉玉

村旁的浯河已覆盖了一层薄冰，西岭的杨树叶子全部落尽，鸟儿筑在树上的窝便格外显眼。田野里一片萧索，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越发衬托出田间的静谧。我伫立在娘的坟前，燃上一支烟，任思绪在往事中徜徉，任泪水在心中流淌。娘，你在那边过得可好？

  娘姓刘，名诗希英，是去年腊月初三走的，眨眼一年过去。一年来，眼里、梦里尽是娘的音容、娘的身影。老话说母子连心，我这回是彻底懂了。娘走了，把我的魂也带走了。

  常常地发愣，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就碰出泪。譬如，端饭时，想起儿时娘把饺子端给爹和我，自己却用饺子汤泡煎饼吃；穿衣时，想起娘为我烤热的棉袄棉裤；卧床时，想起冰凉的手脚在娘身上暖热的情景……一阵阵酸楚袭来，竟无语凝噎。娘年轻时，总是给年迈的奶奶洗脚、剪指甲；娘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就是讨饭的上门，也要端上热汤热饭，临走还要给带上干粮。娘一个农村妇女，没给儿女留下什么家产，但娘留下了勤劳、善良、节俭、慈惠，这些，都如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

  我看书，看到日本名将德川家康的母亲於大在家康功成名就时绝食而亡，理由是上天对自己太仁厚，再活着便是过于奢侈。我读懂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心，一个母亲宽博的心。世人缘何贪婪无度？岂不汗颜！

  在娘去世前三天，我不得不委婉地告诉她身体已经不行了，含泪对她说：“娘，您走了，我就永远没有娘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话对谁说？”没想到娘这时候反过来安慰我说：“你这孩子真傻，哪有当娘的会陪孩子一辈子的，人迟早都要走。”并且跟我说，她十年前就为自己准备了寿衣，就放在橱子里，让我拿出来，告诉我在她走了以后怎么给她穿好，好上路。我泪如泉涌，没想到娘对待生死竟如此豁达。三天后的晚上十点钟，娘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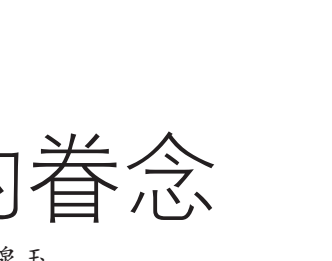
好！”一只手却急急忙忙把那条即将掉落的围巾塞进桌子里，极力装出认真上课的样子，却是一边听讲一边惦记着刚刚学会的新织法。那时候，我是不屑于做这样的事。直到这一年的冬季，我看到了舅娘失而复得的笑容，突然觉得能为自己爱的人亲手织一件毛衣，被他穿在最贴身的地方，是多么温馨而幸福的一件事情啊！于是，我将一根毛线扯起，决心从织一条围巾开始学习。

  想到织围巾，是因为我觉得围巾比毛衣简单得多，应该很快就能上手。在经历了挑选毛线质地、颜色以及织针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我拿出当年填写高考志愿表的神圣与细心，在妈妈的指导下，用笨拙的双手开始了全新的尝试。可谁知错误竟如影随形，那毛线和织针就是不听话，一不小心就漏掉了一针，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形状，或者是织针穿错了地方。

  一条围巾，被我织了拆，拆了又织，反反复复，没完没了，通宵达旦。但我却乐此不疲，傻笑着想象在生命中的某一天，某一个漫天飞舞着雪花的午后，我亲手为一个人围上围巾，想象着他的惊喜与感动，仿佛从此便可以围住所有的幸福……织一条围巾尚且如此不容易，何况毛衣？

  舅舅是幸运的，他娶了为他织毛衣的女人；舅娘也是幸运的，她嫁给了珍惜她真心的男人。

  古代的女人飞针走线，为心上人绣荷包；近代的女人穿针引线，将千言万语缝进衣服里；母辈们挑针牵线，将无限温柔织进毛衣。她们亲手将爱融进这些贴身的衣物中——在夜色里、在灯光下，在甜蜜或忧伤的思念中，一心一意地编织幸福。站在时光的洪流中，一切繁华都成了背景，忙碌的生活中，或许我们再也不会去亲手织一件毛衣了，但我想，什么样的方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份心情：关于温暖，关于爱，关于我们平淡如水的日子里，那些小小的感动。



  走之前十分钟还要水喝，喝完便睡着了。娘是在睡梦中走的，走得从容、安详。

  娘走时八十七岁，说起来也算高寿，可我的心里为何还是充满了痛苦与悔恨？娘活着的时候，每年我都把她接到东营过冬，都是媳妇帮她洗澡、泡脚，我却很少做这些，假如她还在，我愿意天天为她洗脚；娘病重的时候，我请假回家照顾她，换下来的内衣裤我要拿去洗，她不让，对我说：“你先放着，等病好了，我自己洗。”娘不愿给儿子添麻烦，可儿子有什么理由怕麻烦？假如她还在，我愿意为她做一切；娘健在的时候，总觉得跟她没有多少话可说，可如今却觉得有一肚子的气话要跟她倾诉。假如她还在，我会天天陪她拉家常。假如，假如，一切都成了假如，怎不叫儿痛悔万分！

  古语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养”，大概不仅仅是供养、赡养，当衣食住行不再成为问题，做子女的，不是该更多地关注一下老人的精神世界？孔子谈孝，强调“色难”，这个“色”，难道只是脸色、态度？根本还是心的问题，需要更仔细、更用心。再往深里说，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或许是医治丧母之痛的良药。也有人说我是个孝子，以前我也颇为自得；我也曾疾言厉色地斥责过家族里不孝的同辈、后辈；也曾经常无度？岂不汗颜！

  在娘去世前三天，我不得不委婉地告诉她身体已经不行了，含泪对她说：“娘，您走了，我就永远没有娘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话对谁说？”没想到娘这时候反过来安慰我说：“你这孩子真傻，哪有当娘的会陪孩子一辈子的，人迟早都要走。”并且跟我说，她十年前就为自己准备了寿衣，就放在橱子里，让我拿出来，告诉我在她走了以后怎么给她穿好，好上路。我泪如泉涌，没想到娘对待生死竟如此豁达。三天后的晚上十点钟，娘走了，

## 强词有理

# 迷失在数字化之中

  某天和朋友在车上，看到有人卖报纸。我和朋友说，现在资讯媒介这么发达，报纸也难卖了。朋友说：是啊，单是每天手机上网已经能获取大多数资讯了。我跟朋友提到我订了一份电子报，每天准时发送到邮箱。一开始我还每天都看一看，通阅一下标题，后来就淡漠了。只在登录邮箱时顺便看一看，其余时间则置之不理。我和朋友都感慨，现在的信息越来越庞杂，许多御用的，虚假的，炒作的信息夹杂其中，搞得人不看也不是，看也不是。不看吧，总怕学错过了资讯；看吧，很多时候看完也不过如此，无甚影响。

  以前人们讲信息不对称时，往往倾向于将症结归结于传递资讯的媒介，网络的不发达。但是，在媒体与网络甚为发达的今天，如果你细心地理清思路，就会发现，信息依然是不对称的。如今的信息传播，无孔不入。公车上，移动电视的广告不厌其烦地在每个人脑海里留下痕迹——你不得不听。一些小孩在车上分秒不差地与广告词同步背诵，广告效果奇好。通常媒体是在节



  老济南人把油条称为“果子”，何以如此我说不上来，但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么叫的。

  那天早晨爬山回来，看到街口新开了家卖油条的店铺，于是，馋虫被勾了起来，便走上前去想着买些回家当早饭。当我走到摊点前排队等候的时候，听到前面一位老者和摊主的对话。“老板，给我两根果子。”“大爷，我们这里不卖果子，只卖油条。”“我说的果子就是油条，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油条又不是树上长的，怎么能叫果子呢？”我们济南人都是这个叫法，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才来济南没多久，你们这些老济南话我还真听不懂。”“他们说这番话的时候，老者情不自禁地笑了，摊主也摇着头笑了。我听摊主的口音像是江浙人，且来济南的时间不长，要不然何以能不知道老济南人把果子当油条呢？

  老济南话很有意思，就拿对某些食物的叫法而言，就很是让外地人莫名其妙。花生叫长果，红薯叫地瓜，水饺叫包子，玉米叫棒子，土豆叫地蛋，油条叫果子。这些叫法估摸着山东之外的东北人、河北人还能听懂，其他省份的人大概就听不懂了。如今，交通便捷，网络发达，地球似乎变小了，一些老话土话也大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时下济南的年轻人，虽然说话还是老济南话的腔调，但词语却大都国际化了。

  说起“果子”让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1978年岁末，大妹要去部队当兵，离家前夜母亲问她想吃吃什么，她说想吃“果子”，母亲听后立马嘱咐我次日早起来去买。那年月人们的生活清贫，“果子”也不是想吃就吃得买的，离家前提出吃“果子”在今天看似不可思议，可当年对多数人家而言却是再正常不过了。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济南卷烟厂的西工地宿舍，附近还没有卖“果子”的。次日凌晨，天还不亮，我就翻身起床，顶着刺骨寒风，跑到三四里地以外的“青川饭店”买了些油条。这件事说起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至今还深

## 人在旅途

# “大明湖的芦苇怎么样了？”

  “大明湖的芦苇怎么样了？”

  这是诗人冯至给好友杨晦信中的一句话。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当从史料中读到这个句子时，仍被深深地打动了。这是一个诗人对一座城市的惦念。

  1924年夏天，正在北京大学德语系就读的青年诗人冯至，应好友顾随的邀约来到历下。他在历下逗留十日，三次泛舟大明湖。在《历下通讯》中，他这样描述：“我在大明湖里荡了三次船。第一次是夜泛。天上是星光，芦苇里闪烁着萤光，水面上浮萍很多。浮萍开处，自然也可以看见几颗星影。第二次是一个风雨横斜的下午，登北极阁。满目湖山，织在愁雨凄风之中。末季对我说，‘济南此处似江南’。我教怎不怀念大明湖的夜泛，同观浪东海之滨呢？大明湖上的芦苇，想日见萧瑟。”“千佛山上有红叶吗？大明湖的芦苇想已白遍了头。”“你那里的湖上，大

  目过程中见缝插广告，而公车上相反，是在广告主体中见缝插节目。或许，主流媒体也趋向如此了。春节时不就流行一句话嘛：请不要在广告中插播春晚。而当你打开网页浏览新闻，你会发现，很多新闻是无关痛痒的，欲盖弥彰的，混淆视听的，虽然有一些漏网之鱼，但很快也就被补捞了。这也许就是韩寒所说的，“我们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我们在台面上要扭曲和违背一下自己”。

  资讯媒介的发展带来的好处自不必多说，但是随着各种资讯媒介被熟悉与掌控，我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如不费心耗神地加以筛选，则更为信息不对称，因为我们被信息化，被资讯化了。

  最近看到不止一个朋友不约而同在QQ签名上表达对这种被资讯化的厌倦。为了对抗这种厌倦，他们选择了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不上网，不看电视，取而代之的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些朋友都表示在主动与庞杂的资讯世界隔绝之后，身心骤



□ 杨曙明



深刻在我的心里。

  如今的油条是按根买卖，当年的“果子”却是按斤两买卖。一两两根，六分钱一两，外加一两粮票。不过，那时候的一两“果子”实际分量是一两半，一两仅是指一两面，而一两面变成果子就成了一两半了。

  我从小就喜欢吃“果子”，至今还如此，说起“果子”闻到香，或许就是当年馋“果子”留下的后遗症。记得刚从农村回城进工厂那几年，我的早餐多是“果子甜沫”，或“油条豆汁”，虽然偶有换口味的时候，但多数时候还是百吃不厌。千佛山东北门门前不远处有处早餐摊，我早晨只要进山健身，大都是南门进，东北门出，为的就是到那早餐摊去吃“果子”。近些年我每次去“永和豆浆”，很少点别的面食，点的最多的就是“果子”，觉得那馄饨、煎包之类的都不如“果子”好吃。前不久我从北戴河回济南时，在北京南站等候列车的时候，因为时间长些就进了站内一家“肯德基”，先点了碗馄饨，点完后才发现顾客有吃油条的，于是，又追加了两根

  然轻松，得到释放。

  我们越来越被信息化，被资讯化，但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仅剩的一点选择权利——暂时性远离资讯，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也许你会说，这不是典型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吗？但是，当窗外充斥着泼妇骂街，走江湖般地吆喝着挂羊头卖狗肉，秀才与兵讲道理等等世事的话，或许静下心来读一些好书，做些自己喜欢而力所能及的事更有趣，更为放松。

  或者我们还能更中庸一些，运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在获取资讯时尽可能避免被信息轰炸，被资讯化。比如说读报时通览标题，再选择有需要的资讯细读。这是前辈经常教导的方法，在这个“被”时代中显然有用。不过或可有所补充——这不仅只适于读报，读书上网都可用之。对于许多畅销书，通览一下目录，也许已足够。网络亦然，不必每个门户网站都去访问浏览。在资讯媒介如此繁荣的今天，独家报道已大可忽略。对众门户网站来讲，



  “果子”，结果撞了个肚儿圆。我们家现住

  在环山路，街口那家卖油条的店铺开张以后，我便经常去买，而且一买就是四五根，我和媳妇一顿吃不了，剩下的我就留着当零食吃。爱吃“果子”的我有个发现，早餐喜欢吃“果子”的多是我这等了年纪的，年轻人则喜欢吃肉夹馍之类，看来，当年清贫的生活在很多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

  如今食品安全已经成为民生的大问题，“果子”也深受其害。前些年听说炸“果子”有用地沟油的，有添加洗衣粉的，所以我吃“果子”再也不敢像以往那样看到就买，买了就吃。

  时下有些学者喜欢胡言乱语，经常云山雾罩得让人不知所云，对他们说的那些油条吃多了有损健康，容易得老年痴呆症的话，我是坚决不信。当然，年纪大了不管吃什么东西都不应随心所欲了，吃“果子”是这样，吃其他东西何尝不是如此。

  说起“果子”闻到香，管不住的馋虫，管不住的嘴，这味觉的感应是历史的印记，估计得随我走完人生之旅。



  现座座房舍，闯入了桃花源般的境地。想必大明湖的芦苇另有一番情致吧。  湖因泉而成，这是大明湖的独特之处。遥想当年，曾巩在齐州当了三年太守，当时济南虽然泉水丰美，但淤塞不通，湖水置换不畅，西湖(大明湖)景观并不好。曾巩兴修水利，派人疏通了各泉通往西湖的水渠，修建了“北水门”等设施，使西湖“外内之水，禁障宣通”，湖水吐纳有序，水澈清明，成了真正的“明湖”。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离任齐州数年之后，他在《离齐州后》中表达了对西湖(大明湖)的眷恋心境：“将家须向习池游，难放西湖十顷秋。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常到木兰舟。”诗中提及的“七桥”，是曾巩担任齐州太守期间在大明湖周边修筑的七座桥。

  一个修建水渠的文人，没有满足于对泉水的赞美，他为水规划去处，为水寻找家园。这些泉水，最终汇聚成了一个浩大的存在。所有的景色，以及流传下来的那些与景相关的诗句，都是衍生的。曾巩是一个站在源头，并且为泉水规划去处的诗人。

  大明湖一定会记得他，将他从众多的文人墨客里区别开来。

  古书记载，“历下明湖，莲蒲各栽，

  A网站的新闻，B网站必有类似的，出炉的时间也相差不多，随便选一个看着顺眼的，点击查看即可。反而是一些专业性(像文化、艺术、音乐等)的论坛、社区，更值得逗留，从里面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电脑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网站摘要阅读器。这是个不错的东西，可以选择性地从各种互联网资源中订阅自己感兴趣或想得到的分类信息和资讯。随着手机与电脑之间界限的模糊，这种订阅在手机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不过正如我开头所提到的订阅电子报，虽然是选择性的订阅，但如果当做任务强迫自己接受，每天都去浏览一番，则仍会使自己感到疲倦，甚至厌烦。

  数字化使资讯媒介与网络无处不在，而我們也需要它们。但是假如我们本来倒置，成为数字化的附属品，那必定是迷失在其中而疲惫不堪。与其保持适当的距离，也许会轻松许多。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随性的东西在今天被不断挖掘、推崇的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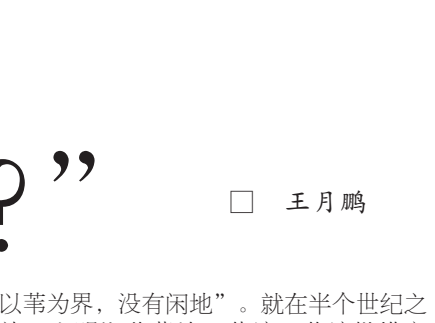


  狭义的文人，就是能写点小说、诗歌、散文，并且还能在纸质媒体上发表。不能发表，写得再多也上升不到文人这个层级，顶多只能算是一个爱好者。文人单从作品的影响力来看，有大文人、小文人之分。大文人一般都与“大部头”扯上了关系，譬如巴金、茅盾、沈从文等，这都是大师级的人物；而小文人注定是小敲小打的，写了一辈子，也没闹出多大的动静来，写到最后，连他自己也不无揶揄地说是自娱自乐。文章写得烂，无论哪一项都不入流，那就只能屈居“三流文人”的行列了。不管是哪一类的文人，都是值得敬重的。

  有一种“文人”在较深深地接触和了解之后，却只有打心眼里的厌恶，我称之为“伪文人”。初打交道，这种人往往派头不小，听其言，开口闭口都是名流名家，要不就是他的某某大作在哪儿发表了，又在何处获奖了，某知名作家和他一起吃饭了。观其行，一会给这个签字，一会与那个纵论文章文事，神通广大，无所不知。进入这类文人的空间或博客，更是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气场大得不得了。天南地北的笔会都有他的身影，传说中写作这行的名流与他的合影……好在这一切都不是假象，真相又是什么呢？

  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这类文人特色不少。特色之一就是包装，别看写出来的东西不咋的，但可以自费买个书号，请来如雷贯耳的大家写序，这就出了书。按时下某一级作协不成文的规矩，只有有了专著，才有资格加入。作协虽然是民间组织，但授了衔就是官，是官就有了对他人指手画脚的资本，还可以出席什么讲座，请来几个记者在媒体上渲染渲染，名气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虚名虽然值不了几个钱，但可以满足虚荣心。伪文人从一开始也不想背负一个“伪”字，只是时间久了，对自己几斤几两多多少少有点数，也知道在写文章上捞不到他想要的每一桶金，完全地放弃，又心有不甘，那咋办呢？还能咋办，只能动动歪脑筋，各种光环只要能往脑袋上扣，就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给，他可有的是耐心和时间里跟你慢慢理论，各路神明不失时机地结交，看起来像一个虔诚的修行悟道者，只是怎么修行就是成不了佛，反而越发地令人可憎。于是，原本温文尔雅的文人，因为有这些货色的存在，水也变浑了，弥漫着可恼的戾气，浮躁之气和无法忍受的俗气，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风波连连才是怪事。



  以苇为界，没有闲地”。就在半个世纪之前，大明湖蒲菜地、苇塘、荷塘纵横交错，湖民在湖中的小岛或湖中分割藕塘的阡陌旁劳作时，经常发现散落于苇丛中的野鸭蛋，他们从不占为己有，随手将其就地掩埋，以保证小鸭的日后孵化。

  这种素朴的行为，是当年的人与自然物我相融的一个诠释。

  我曾不曾见过湖中的芦苇，也没有见过湖里的野鸭。我只是一个浮光掠影的匆匆过客。

  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清晨，我下了火车，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城市街头漫步，像一个晨练者一样。天刚蒙蒙亮，路人都在匆忙奔向住处。我一个人在历下的街头行走，从清晨一直走到中午，我以陌生的眼光打量这个城市，试图用脚步丈量 and 认识这个城市。我也想到了，那些历史上的先贤曾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以及“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旧日情景。千佛山在不远处，一派安详的样子。山下，有我惦念的师长，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注视着我的写作与成长。

  “大明湖的芦苇怎么样了？”我默念诗人冯至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问语，心里满是感动。